

---

# 蒲松龄宗教实践寻迹

——以《蒲松龄集》为中心

刘敬圻

**内容提要** 蒲松龄虽不曾皈依任何宗教，却具有正宗信徒的虔诚素质。其相关纪实文字的兴奋点是：宣扬多神崇拜与三教融通的乡土风习；铭记“上人”“善信”们的“挑脚夫”功德；企盼宗教圣地与自然景观的合一互补。梳理蒲松龄的宗教纪实文字，寻绎作者参与宗教活动的朴素印迹，可以为《聊斋志异》的“小说指归”增添一种解读参照。

**关键词** 多神崇拜 《聊斋志异》 蒲松龄 上人善信

十七年前，笔者曾梳理过小说《聊斋志异》中的宗教现象<sup>①</sup>，那是蒲松龄借助虚拟故事抒写的宗教理念和浪漫情致。这里，则着重梳理《蒲松龄集》中涉及宗教活动的纪实文字，寻绎蒲氏宗教实践的朴素印迹，为小说的“指归”增添一种解读参照。

## 从众与随俗：多神崇拜的原始色调 三教融通的乡土风采

《蒲松龄集》<sup>②</sup>收录了与宗教活动相关的纪实性文字三十七篇。如果说，“宗教包含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sup>③</sup>，那么，《蒲松龄集》中的相关篇章主要不以阐发宗教教义见长，它缺乏系统严整的论说宗教学理的思辨精神；这些文字，主要记述了作家亲近与礼敬神灵，鼓呼并参与民间宗教事务的一桩桩具体作为。细读这一类文字，会看到一位家境清寒、心地淳良的乡村书生热心乡土宗教建设的执着性格和忙碌身影，是对其谈鬼谈狐、刺贪刺虐的文学生命价值的重要补充。

无论是“文集”还是“志异”，无论是作者“自述”还是友人评介，都清晰平和地告诉人们，蒲松龄不是一位已经皈依佛教或道教或其他任何“人为宗教”的正宗信徒。但是，他却无可置疑地具有虔诚信徒自当具有的正宗素质：相信超自然物的存在；相信超自然物能够作用于（即影响）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对超自然物产生崇拜，产生降福或避祸期待。

《蒲松龄集》相关纪实文字的共同兴奋点，正是“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sup>④</sup>，是这一兴奋点的告白与倾诉。

当然，“超人力量”不止于神灵，还有古已有之、至今不衰的对“运数”的敬畏。蒲松龄在《〈会天意〉序》中曾经明白无误地表述了他对“运数”的臣服：

顺顺逆逆，各有定数。

一造一化，出于自然，而不容己；一治一乱，本乎运数，而不可更。所以天地之常变，人事

---

① 《〈聊斋志异〉宗教现象读解》，《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② 路大荒整理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编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④ 弗雷泽《金枝》中译本，上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之得失，两相征验。一念善，即应景星庆云；一念恶，即应飞流李彗；一念喜，即应和风甘雨；一念怒，即应疾雷严霜。德之污隆，政之成败，应若桴鼓，捷如发机……孰谓冥冥之天，非昭昭之天也！<sup>①</sup>

运数，毕竟是形而上的哲理意味的东西。民间的、周边的、耳闻目睹的神灵崇拜现象，才是年年月月每日每时萦绕身旁的鲜活存在。蒲松龄作为少年成名的才子，作为游走南北的捉刀幕僚，作为乡绅大户的西宾，他按捺不住对那一方土地上或大或小、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的宗教建设活动的热诚，他也逃脱不了力所能及的责任。

那一方土地，自然是以他的出生地为中心，漫延到临近县府以及他的声名所及的地方。如淄川，淄东，淄南，淄西，淄西南，淄北，还有蒲、杨两村和故里满井，这些地名都出现在他的宗教纪实文字中。此外，临近的王村、章丘、历城、岳阳山、武定州（辖九县一州，府衙在惠民），还有尚未查实其属地的颜神镇、马家庄、王西桥等，也一一进入相关纪实文字，其中王村的出现频率为最。

在蒲松龄魂牵梦绕的一片土地上，流行着从原始宗教延续下来的多神崇拜风习。那里，有一座座历时久远的或正在筹建的或亟待重建的庙祠；庙祠里供奉着渊源不同的各路神灵；每一个善男信女都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座庙祠去祈求任何一位神灵的护佑。他们入乡随俗地礼敬天地、祭祀鬼狐、迷信关羽，又无论远近亲疏，同时供奉着佛、道谱系中品位不等的偶像。在蒲松龄参与并记载的宗教活动中，留下了、展示着强劲的多神崇拜信息。

诸如：

崇尚儒家三圣，佛家三圣，道家三官<sup>②</sup>；

尤崇尚白衣大士，关帝，文昌帝君与药王<sup>③</sup>；

此外，执掌冥界的地藏王，掌控旱涝的龙王，维持地方治安的城隍，五行中的“后土”，泰山神的后裔炳灵公，还有“不知为何人”的灵感圣母，以及最基层最亲民的山神土地，乃至始于宋元兴于明初的妖邪之神“五圣”（五通），都在虔心供奉之列<sup>④</sup>。

面对民间的原始的多神崇拜现象，蒲松龄持有一种平和、包容、通达的从众心态，即使被邀参与的、以“某某代言人”出现的宗教实践中，他也始终贯注着温存、诚笃、愉悦的主体情致。

尽管如此，由于体裁的制约，蒲松龄纪实文字中的多神崇拜现象，远不及《聊斋志异》那么汪洋恣肆。由于体裁赋予的编故事、讲故事的优势，《聊斋志异》的多神崇拜较诸纪实文字更宽泛更灵动也更富有人间烟火气息。除了佛教神系、道教神系及原始宗教流传下来的神灵之外，人皆敬畏的天地山川江河湖海，人皆喜爱的花鸟虫鱼奇珍异兽，以及人皆畏惧的狼、蛇、虎、魅等，都可以成为人类的朋友，成为赐福与避祸的吉星。尤让人回味无穷的是，当一个书生，一个好人，遭遇重大磨难的时候，往往有各路神灵先后出现，齐抓共管，联手相救（如《汤公》、《钟生》等），让受难者享有了多重护佑带来的超级安全感觉。

① 《蒲松龄集》上卷，第55页。

② 见《募修三教堂疏》，《团山顶募修三教堂疏》，《王村三官阁募铸钟序》，《蒲松龄集》上卷，第115页，第111页，第70页。

③ 见《为觉斯募修白衣殿疏》，《颜神镇报恩寺募修白衣殿疏》，《北沈马庄募修白衣阁关帝庙疏》，《关帝庙碑记》，《和尚起禅募神供疏》，《文昌碑记》，《代王丕哉募修文昌阁疏》，《三皇庙建药王殿序》，《王西桥募修药王殿序》，《蒲松龄集》上卷，第108页，第110页，第114页，第43页，第115页，第42页，第112页，第73页，第80页。

④ 见《王村募修地藏王殿序》，《募建龙王庙序》，《木城隍碑记》，《后土庙募缘疏》，《募修炳灵庙疏》，《王村重修炳灵庙募缘序》，《圣水沟募修大殿序》，《募修姜家庙疏》，《创修五圣祠碑记》，《蒲松龄集》上卷，第75页，第74页，第45页，第112页，第108页，第72页，第71页，第109页，第43页。

对多重护佑的期待，也呈现在蒲松龄的纪实文字中。只是受体裁的规定，不可能像小说那样起伏跌宕，而以更直接、更直观的方式展示出来。

“代孙戍吉”立言的《关帝庙碑记》，把蒲松龄对神人关系的质朴领悟，把人们对双重（多重）神佑的质朴期待，给以明澈透辟的表述：

今夫至灵之谓神。谁神之？人神之也。……日星河岳，雷霆风雨，昭昭者遍满宇宙，而人则何知？其慈悲我者则尸祝之耳。故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神道中惟伏魔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所以樵夫牧竖，婴儿妇女，无不知其名、颂其德、奉其祠庙，福则祈之，患难则呼之。惟观自在，惟纯阳子，惟伏魔帝。三位神灵，在作家心中，平分敬畏与亲爱。以上表述，不是浮光掠影，不是云山雾罩，而是一种明澈坚实的信仰理念。

还有更为质朴深厚的信仰现象。那一方土地的多神崇拜习俗，不仅仅散落在各个村镇山峦不同神灵的庙祠之中，而且大模大样、自然而然地呈现在同一座庙祠的狭小但肃穆的椽檐之下。

换言之，在一座座并不宏阔的庙祠中，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总是洋溢着浓浓的三教融通的和谐景象。而这种景象，在那一方土地上，在那一带百姓中间，在蒲松龄的魂魄、血液、骨髓之中，都视之为古往今来世代相传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淄西范村“三教堂”。

这里的“三教堂”是由聚善庵、文昌祠、三圣殿集聚而成的。蒲松龄为它的“募修”而写的“疏”，其开篇便直奔“三教”互补之主旨：

第一句“窃惟函关紫气，翔戏尘寰”，是对道教的礼敬。借杜甫“紫气东来满函关”诗句。紫气，祥瑞之气，它伴随老子的出现，降临人间。

第二句“鸞岭丹云，慈悲宇宙”，是对佛教的礼敬。鸞峰即鸞山，借指佛地佛寺，赐福九州。

第三句“麟游阙里，铎响尼山”，是对孔子的礼敬。“孔传”：“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sup>①</sup>

正是有了儒道释的共同护佑，淄川一带“从此，人文鹊起，争探骊珠，科举蝉联，竞烧龙尾”<sup>②</sup>。

又如，北沈马庄“关圣祠，白衣殿”。

北沈马庄“旧有关圣祠，白衣殿”，因历年久远，更因“规模之隘，又遭风雨之摧”，村中父老“眷言太息，思欲新其庙堂，增以式廓”，重修白衣之殿，并更新壮缪之祠。蒲松龄在《募修白衣阁关帝庙疏》中，直白地宣告了他与“父老人士”祈望双重神佑的纯真期待：期待在白衣大士和关圣帝君联手呵护下，“同培福慧之根”，“共结人天之果”；让“人间雨露，随红马而俱来，天上麒麟，与白衣而俱下”<sup>③</sup>。

又如，马家庄的“白衣庵”与“文昌阁”。

文昌神、文昌帝君的渊源其说不一<sup>④</sup>，但有两点是肯定的，即吸纳了原始宗教对自然星辰的崇拜；自宋元以降，已被道教信徒列入道教神谱系。蒲松龄代王丕哉所拟《募修文昌阁疏》中，追记了王丕哉先辈及王丕哉兄弟创建、续建白衣庵与文昌阁的艰难而执着的历程：马家庄外，旧有王丕哉先叔创建的白衣庵。创庵之初，已留隙地，“意将建文昌阁”。未竟，创建人及其“同志者”相继弃世。当时王丕哉兄弟皆幼弱，不能及早了却先人遗志。成人后，“偶检故牒，得旧籍，读其文，泪涔涔不自禁”。由是而“上承遗意，而敛丐四方”，终于在白衣庵旁，实现了先人与前辈创建文昌阁的初衷，也

① 《尚书注疏》卷六，《夏书·胤征》孔氏“传”。

② 《蒲松龄集》上卷，第115页。

③ 《蒲松龄集》上卷，第114页。

④ 参见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中“文昌神”、“文昌帝君”词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成就了马家庄一带善信对白衣大士和文昌帝君双向崇拜朝夕供奉的夙愿<sup>①</sup>。

再如，道教阁与佛家语的默契。

蒲松龄有一篇为“三官阁”募钟的文字。“三官”，源于原始宗教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自东汉以来即奉为主宰人间祸福的大神，后被列入道教神系。《古今图书集成·神异类》卷四六引《蠡海集》：“人曰老氏之徒有天、地、水府三元三官之说。”<sup>②</sup>蒲松龄当然知道“三官”已归入道教神，然而，他为王村“三官阁”募钟所撰写的情文并茂的文章，却是这样开篇的：

闻佛家云：“寺观钟鸣，则冥刑不施于鬼。”然耶，否耶，是未可知。然兰若必有钟。谚有之：“作一日僧，则一日筵撞之矣。”<sup>③</sup>

可以断言，在作家的理念与实践，只是单纯的满溢着对三教神灵的无与伦比的崇敬，而不存在派系、门户和其他任何樊篱。

余不一一。

要之，色彩斑斓的神界与天国其实“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sup>④</sup>，最具世俗味与人间烟火气息。蒲松龄的纪实文字中，不厌其烦地让各路神灵郑重登场，祈望它们永不懈怠地干预人生，给凄苦无助的受难生灵以程度不同的慰抚与补偿。这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世俗性特质在一个乡土文学家身上的投影。

蒲松龄特有的人生遭际所带来的特有的务实惯性，注定了他的从众随俗惯性，注定了他与乡里乡亲、凡夫俗子们同声同气。

### 珍惜与感恩：铭记“上人”与“善信”功德 彰显仁、义、礼、信、勇光泽

蒲松龄故里并周边州县虽多有“长税之亩”和峻丽山溪，但并非富饶之乡。先辈们呕心修筑的庙祠们也因历时久远，风雨剥蚀，而凋零残破，且得不到及时修复，甚至成为“马勃牛溲”、“鹊栖鼠窜”之地。作家每过之，必有撕肝裂肺之痛。诸如：

年少时“尝抱卷咿唔其中”的“三教堂”，四十年之后，竟“雀鼠穿墉，藓苔蚀壁，百材俱败，四墙将倾……”<sup>⑤</sup>

“姜家庙”是蒲、杨两村父老乡亲祸福倚傍之圣地，每“遭凶则哭于斯”。然“近年”来，“壁裂欲欹，瓦以零落，漏痕下鬼面矣”<sup>⑥</sup>。

“昔先大人与先从祖”所创之“白衣殿”，“迄今日三十余岁”，亦已“漏湿风吹，金颜剥落”，“蠹窠蝓迹，彩壁凋零”<sup>⑦</sup>。

王村“炳灵庙”，“历年久远”，“茂草复荒之，雨淫漏下，风起尘凝，椽之白以菌，座之碧以苔”，“加之雀栖鼠窜”，“寺不隔藩篱，市不分疆界”，“醉人枕闼以卧，扎驹檐柱，汗衣胃案，马勃牛溲，流离阶阼，寺也而市焉矣”<sup>⑧</sup>。

又一“炳灵庙”，亦因“历年久，天风雨之，地震动之，垣壁又自苔藓之，内行零落，几莽为

① 《蒲松龄集》上卷，第112页。

② 参见宗元、刘群《中国民间诸神》，第60页。

③ 《蒲松龄集》上卷，第70页。

④ 《蒲松龄集》上卷，第43页。

⑤ 《蒲松龄集》上卷，第115页。

⑥ 《蒲松龄集》上卷，第109页。

⑦ 《蒲松龄集》上卷，第108页。

⑧ 《蒲松龄集》上卷，第72页。

墟’；‘西廊栖之狐，而东廊则露之兔；东廊犹雀有室，而西廊则鼠无家矣’<sup>①</sup>。

另，淄之“北寺”；“先大人所创建”之“玉溪庵”；王村之“地藏王殿”等也均因年代久远，“垣也，风雨之；殿也，鼠雀之；像之庄严也，又自苔藓之”<sup>②</sup>。“十王冠冕，着雨崩摧，满月泥金，随风飘落”<sup>③</sup>。“庙苔碑藓，多历岁时”，“廊前断瓦，久落荒台”，“仓鼠昼窜，玄狐宵栖”<sup>④</sup>。

各路神灵的庙祠，还不止于自然风雨、愚昧路人之侵袭，还会遭遇意外灾难的吞噬，比如“山火”。淄西“团山顶”的“三教堂”便因“燎原火至”，致使佛殿僧寮“炬为焦土”，只剩下孤苦老僧“独卧灰烬之墟，狼狐嗥叫于侧”的凄凉<sup>⑤</sup>。

目睹每每重复出现的此类情景，“居士为之怆心，行人为之悼叹”<sup>⑥</sup>，作家更是“每过三叹”不已<sup>⑦</sup>。悼叹之余，屡屡激发出“慨然倡善，使神人并得所栖”的执着，以及为庙祠创建者们、重建者们、守护者们立传树碑的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十几篇纪实文字正是一部“感恩录”，它毕恭毕敬地逐一铭刻下先辈、上人、善男信女们的无量功德。

有两篇文字，感念同一位仁、义、礼、信、勇的“老僧”。

老僧寄迹团山三教堂，已历多年。不意燎原火至，“佛舍僧寮，炬为焦土”。乡人“或怜老僧，相劝他徙”，老僧断然婉拒：

昔年殿堂完好，囊装衣具而来，今日院宇萧条，峭紧草鞋而去，不惟生羞兰若，抑恐没堕泥犁。用是独宿孤峰，自盟香誓，流铃三界，托钵十方，积一簣而为山，丐多宝而成塔。务期涂灰架木，新殿阁之庄严；以瓦易茅，改规模之朴陋。苟造福功成，则挑脚愿遂矣。<sup>⑧</sup>

这是正宗宗教信仰的伦理追求。他恪守虔诚，高扬礼信，以“流铃三界，托钵十方”的坚持，去实践“积簣为山”、“丐宝成塔”的信念。一种足以与“马革裹尸”相媲美的勇士精神。尽管“任重而道远”，“年余渐次兴作”之后，“老僧亦寂矣”，然“幸其徒克成阙志，又复苦募金资，经营数年，工以落成……”<sup>⑨</sup>，老僧精神得以不朽。

又，铭记，为淄南王西桥三皇庙“铸药王菩萨”而“一瓶一钵”“终日敛铁”的那位“游僧”<sup>⑩</sup>；铭记，为“水陆神像（四十余帧）”移离“市肆”“设坛供养”而“沿门托钵、求诸檀越”的王村“清贫僧人”<sup>⑪</sup>；铭记，为重修岳阳山后土庙而“隐然动菩提心，慨然作挑脚汉”的“道宗法师”<sup>⑫</sup>；铭记，为淄南三皇祠“敛金冶肖药王菩萨”，“像成遂去”的游方“道士”<sup>⑬</sup>；铭记，为修复淄西三教堂而“广募人寰，重辉宝像”的“完朴李法师”<sup>⑭</sup>；铭记，护守炳灵庙神祉，“夜藉稿神脚下，炊烟腾败堵中”的香火道人<sup>⑮</sup>；铭记，为淄东柳泉风调雨顺而“立意募祠”，重修龙王庙的“天性上人”<sup>⑯</sup>；铭

①⑦ 《蒲松龄集》上卷，第108页。

② 《蒲松龄集》上卷，第74页。

③ 《蒲松龄集》上卷，第75页。

④⑥ 《蒲松龄集》上卷，第45页。

⑤ 《蒲松龄集》上卷，第69、111页。

⑧ 《蒲松龄集》上卷，第111页。

⑨ 《蒲松龄集》上卷，第69页。

⑩ 《蒲松龄集》上卷，第80页。

⑪ 《蒲松龄集》上卷，第76页。

⑫ 《蒲松龄集》上卷，第112页。

⑬ 《蒲松龄集》上卷，第73页。

⑭ 《蒲松龄集》上卷，第115页。

⑮ 《蒲松龄集》上卷，第108页。

⑯ 《蒲松龄集》上卷，第74页。

记，为淄北“古兰若”“晨夕洒扫”并“积有流铃之愿”的“上人无戒师”<sup>①</sup>；铭记，为王村地藏王殿“独抱旗铃，广募十方，不惜发体”的“某上人”<sup>②</sup>等等。他们鲜活地驻守在那一方百姓的心中，宁静地伫立在《蒲松龄文集》的字里行间。

宗教建筑的创制与重建，是一项呕心沥血、旷日持久、师寂徒承、父逝子继的特别工程。更为久远的姑不论，仅从明嘉靖至清初近二百多年以来的社会贤达和善男信女们的美丽故事，已经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已被一一铭刻在蒲松龄相关纪实文字中，而流播永远了。其中，“嘉靖年间”的张氏昆仲<sup>③</sup>；王丕哉的“先叔雪因翁”及其“同志者”孔绣先生<sup>④</sup>；创建与重修“玉溪庵”的“先大人”、“故观察沈公”、“杜善人”以及“里中王某”<sup>⑤</sup>；创建满井白衣殿的“觉斯的先大人与先从祖”<sup>⑥</sup>；创建“城隍庙”的周才龙与杨某母子<sup>⑦</sup>；改创与修复“文昌殿阁”的“崇祯某年韩忠烈公”、“戊子陕西韩公”、“诸生赵某”<sup>⑧</sup>；为王村关帝庙“别造三楹之殿”的毕刺史<sup>⑨</sup>；新创龙王庙碑的“吾祖侄汶、隰、淳”<sup>⑩</sup>；以及重修炳灵庙、关帝庙、白衣阁的“村中善士”、“父老人士”<sup>⑪</sup>等等，都是蒲松龄和乡里乡亲们口碑相传、感念不忘的先辈、朋友和亲人。蒲松龄抑制不住对仙逝前辈和低调贤达的缅怀、敬仰与感恩。在《重修玉溪庵碑记》中深情慨叹道：

呜呼！阁尚临江，无复建阁之人；桃已结子，不见种桃之客。

无论仙逝的还是尚存的，也无论社会身份、家族背景及个人遭际如何千差万别，献身宗教事业的人们有着显赫的共同点：对仁义礼信勇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不是抽象的理念或难以捕捉的，而是看得见、摸得到、具体细琐的实践与作为。用蒲松龄的话说，是一种“挑脚夫”品性和行动，一种“流铃三界四方”、“沿门托钵”、“铢铢乞之”、“鸠工庀材”、“涤灰架木”、“以瓦易茅”、“合力捐修”的苦行僧功夫，一种名实相符的“蚊背负山”精神。

“挑脚夫”，是蒲松龄纪实文字中一而再、再而三，不间断出现的词语。献身庙祠创建或重建的信徒，被比作“慨然作挑脚汉”者<sup>⑫</sup>；把“造福功成”的喜悦，比作“挑脚之成功”，“挑脚愿遂矣”<sup>⑬</sup>；对理想愿景的期待，也寄托在“挑脚夫”身上“诸善信福业圆满，则挑脚者为功臣耳。”<sup>⑭</sup>

务实的性格，决定了蒲松龄关注宗教事务的思维定势。他对上人、贤达、善信们的感念，总是具体的，喜欢立竿见影的，医了头说头，医了脚说脚，而罕见极目四方，整治九州的总体性思考。同样，他对宗教建设的期待，也总是散落在热心公众事业的一位又一位志士仁人身上，期盼着更多良知未泯的人去承传他们的善举，延续他们未竟的宏愿。这一思维定势，虽说深深植根于乡土中，虽说与“地气”骨肉相连，但毕竟主要是为弱势群体代言，透发着弱势群体的谦卑而低调的诉求，显敞出弱势群体的浓浓的虔诚和淡淡的悲催。

这也是“挑脚汉”的可敬与可悯之处。

① 《蒲松龄集》上卷，第74页。

② 《蒲松龄集》上卷，第75页。

③ 《蒲松龄集》上卷，第71页。

④ 《蒲松龄集》上卷，第112页。

⑤⑦ 《蒲松龄集》上卷，第45页。

⑥ 《蒲松龄集》上卷，第108页。

⑧ 《蒲松龄集》上卷，第42页。

⑨⑭ 《蒲松龄集》上卷，第115页。

⑩ 《蒲松龄集》上卷，第46页。

⑪ 《蒲松龄集》上卷，第72页。

⑫ 《蒲松龄集》上卷，第112、75、111、115页。

⑬ 《蒲松龄集》上卷，第75、111页。

从一定意义上说,“挑脚汉”精神,也正是蒲松龄的性格脊梁。他特有的出身阅历和学养,让他成长为敏感而沉稳、浪漫而务实、视野开阔而植根乡土的文学家。“他绝非坐议立谈的才子,也不是象牙塔里摩拳擦掌的思想家,他独具个性的人文精神正表现在对周边苦难的由衷的、强劲的、恒定的世俗关怀上面。每当直面天灾人祸之际,他从不发表徒具哲学或史学意味的泛泛宏论,而是提供一系列源于直接生活经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整饬方案……他的社会批判和社会理想的坐标并不飘渺高远,他不过想补救一下他头顶上那块残破的天。”<sup>①</sup>

这段话,是笔者十七年前对蒲松龄的“小说指归”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与蒲松龄宗教实践中对“挑脚夫”精神的高扬,或许有同一性吧。

### 圣地与景观:信仰与审美合一 神址与风物互补

蒲松龄诗集中有一组题寺观的诗,这些诗,几乎无一不是准山水诗。如《重游青云寺》、《登玉皇阁》、《游龙寺》、《千佛山》、《游大佛山》、《大佛寺》等。如:

壁峭芙蓉万仞丹,禅林隐隐画图看。人间胜地僧多占,洞里诸天客到难。云傍龙来晴作雨,风从涧底暑生寒。年来剩有烟霞癖,石畔长松好挂冠。(《游龙寺》)<sup>②</sup>

去廊十余里,山回石径幽。白云常覆寺,黄菊最宜秋。塔影樽前转,湖光望里收。甘泉几滴水,能解世人愁。(《千佛山》)<sup>③</sup>

深山春日客重来,尘世衣冠动鸟猜。过岭尚愁僧舍远,入林方见寺门开。花无觅处香盈谷,树不知名翠作堆。景物依然人半异,一回登眺一徘徊。(《重游青云寺》)<sup>④</sup>

记载宗教实践活动的疏、序、记等,大体上属于今日所说的“应用文”,不是什么描写自然景物的散文随笔。然而,在这些纪实文字中,却洋溢着作家对自然景物的百般钟爱和万般珍惜。对那些环抱着一座座庙祠的山川林泉如何清幽壮丽,又如何伴随着庙祠的凋敝也惨遭亵渎的细腻摹写,不时地从笔端汩汩而出。其中,似乎按捺不住、不断重复地透露出两种情绪:叹赏与叹息。把对神灵的钟爱与珍惜和对大自然的钟爱与珍惜,一体化了。

也有只叹赏而无叹息的文字,不过二三。以《募建龙王庙序》为最。龙王庙建于柳泉。柳泉以名泉和巨柳而得盛名。文章中对“泉”的描写远胜于“柳”,对“泉”与“柳”的描写又远胜于“龙王”。文章题目(或副题)理当称之为“柳泉颂”:

淄东七里许有柳泉……水清以冽,味甘以芳,酿增酒旨,瀹增茗香……深丈许,水满而溢,穿瓮石出焉,故土人又名满井。泉涓涓自流,自溢,自波折……汇者渊之,流者溪之,夏潦秋霖,客水相续,则泱泱然河矣。兰若外为泉,泉外为河,河外为山,山族而居。每坐泉上,小山簇簇,作儿孙罗列,圆如米聚,方如印覆。削壁开,丹嶂立,杂以垂柳绿杨,萦青绕白,浑无断际。河之阴一道,通南北往来,解赏者辄坐流连。冬之日,瓮石为燠;溽暑行人,望泉投止,脱汗笠,解衣冒柳腰,则饮,则浴,则憩坐,坐顷,风飏飏,泉水泠泠,自谓予蓬莱不易也。……瓮石不甚斧凿,为游人所坐,衣磨拂而滑之矣。泉傍柳大百围,为雨浸而以濡而空之矣。泉最久,故其神最灵,每暘亢,远近异柳辇驻其下,呼神者三,谷渊渊有应声,其声彻,雨则立澍。(《募建龙

① 参见拙文《〈聊斋志异〉宗教现象读解》。

② 《蒲松龄集》上卷,第668页。

③ 《蒲松龄集》上卷,第670页。

④ 《蒲松龄集》上卷,第532页。

王庙序》<sup>①</sup>

如此清冽神灵的泉，自当建龙王庙供奉，让历代受益的“土人”和“游人”“祈祷有所依凭”。这是虔诚信徒和一方百姓的共同心志。而作者呢？他在认同“立意募祠”者“其志良佳”的同时，于篇末则特别郑重地宣称“彼为一方祝顺调，愚兼喜为邑中点景色也。”在神灵崇拜的肃穆中，不掩饰其审美需求的活泼泼的流淌。

而当清幽壮美的自然景观与神圣庙祠一道濒临困境时，作家的叹息便伴随着叹赏，一并倾泻出来。今日的叹息是由昨日的叹赏生发出来的。叹惜的指归，正是祈盼恢复（还原）当年让人叹赏的神址和风光。作家在另一篇记载柳泉龙王庙盛衰景象的文字中，直白地迸发出赏、叹、怨、愤情绪，从而又一次证明蒲松龄对人间“胜地”的崇尚与关注，已近极致：

……泉旁有古柳，围以丈许，岁久中空，渐为无赖者薪之矣。赖吾祖侄汶、隰、淳等，植柳二十余株，柏四株，余为物色线柳四株，以点景色。倘后人克踵此志，益增成林，则神人胥悦。如有异姓之豪强，宗人之不肖，损一石一树，村中当共击，勿惜面而毁吾胜地也。（《新建龙王庙碑记》）<sup>②</sup>

又如“玉溪庵”昔与今：

（玉溪庵）南接层峦，下瞰幽谷，白石齿齿，如玉不穷，秋潦霏霏，成溪无际，傍山临壑，因以为名。创建至今，盖有年所矣。庙苔碑藓，多历岁时，佛面泥金，渐蚀风雨，遂使廊前断瓦，久没荒台，几令野外偶人，还乡故土。仓鼠昼窜，玄狐宵栖，居民为之怵心，行人为之悼叹。<sup>③</sup>由此引出“故观察沈公”、“余兄弟”、“杜善人”、“里中王某”的种种善举，不辞厥劳，克终其事。实现了“或使庵罗国里，果树常存，薝卜林中，华香不谢”的愿景（《重修玉溪庵碑记》）。

再如，“团山”古兰若的昔与今：

团山，淄西南之奥区也，在深山邃谷中，于群峰最长，然不以锐胜，遥望之如覆釜然，丰林茂草，鹿眠而家焉。春夏交，连天一碧，秋残则露霜黄之，经冬月之日，风燥而白，与云一色。云行草际，草长云中，云与天接，山与云接，莽莽苍苍，上下无际……每岁朔风起，木落变衰，过山之无赖贼，以闲情肆虐；或山根之有田段者，欲借灰燎以沃其亩；辄纵火丰草中，延烧数日，大地佛子皆罹池鱼之殃勿论已。顶上有兰若，殿宇似中古时物，皆茅茨，当火弥漫时，其几备炎昆者数矣……佛殿僧寮，炬为焦土。（《团山顶募修塑佛像序》）<sup>④</sup>

景物宏阔壮美的“团山”及古兰若，生生毁于“无赖贼”和愚昧山民的肆虐。由此引出执着老僧及其徒儿“苦募金资”，“经劳数年，工以告成”的无量功德，作家亦得以心慰等（惜未道及“肆虐”者而已受到惩戒与约束）。

余不一一。

要之，蒲松龄的宗教实践中，其信仰崇拜和审美需求，是水乳交融难解难分的。还不止于此。在少数纪实文字中，他对自然胜地的关注甚至超越了他对圣地神灵的期待。如叙及“圣水沟”之“方池”、“长溪”与“灵感圣母”的文字：

圣水沟在淄东，邑之胜地也，水以“圣”名，不知昉于何代。有祠祀灵感圣母，亦不知圣母何人。……有古柏参天，映蔽四堵，围以丈计，盖千百年物也。旧有方池，水清以澈，磬石四缭，游人来辄坐以憩，玩莹莹状，听泠泠声，移晷始去。年值亢阳，河不流，此泉无涸时，深可以汲，

① 《蒲松龄集》上卷，第74页。

② 《蒲松龄集》上卷，第46页。

③ 《蒲松龄集》上卷，第45页。

④ 《蒲松龄集》上卷，第69页。



挹可以濯，香冽可以瀹茗，祷雨辄应，岂灵感与？意水之圣，以圣母故圣之；母之圣，以灵感故圣之。……顾自天顺年已经再废，灵迹不可复考，池亦湮没，今平地矣。而观前有长溪，石桥驾之，水涓涓不绝，小鱼瞥之，于莛于沙，蟹随涯而穴，游者没肱取之，携酒柳荫，举网得小鲜与蟹同烹，欢呼竟日。（《圣水沟募修大殿序》）<sup>①</sup>

如此清幽秀丽的胜地以及无辜的小鱼小蟹正在遭遇践踏与屠戮，作家焦虑万分。尽管囊中萧瑟，愧对创建与重建的先辈前贤，但依然不放弃“与好善者共成之”的痴迷心愿。何以如此？一则是对灵感圣母与圣母祠的崇敬；一则不能眼见“千年古迹”、“一邑佳胜”毁于一旦。而后者尤为沉重。请仔细品味以下的文字：

无论圣母其谁与，其灵感与否与，而千年之古迹，一邑之佳胜，不能增其壮丽，亦不可听其倾圮也。<sup>②</sup>

一种呵护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沉甸甸的历史责任，炎黄子孙的责任。这种情致，完成了宗教信仰与审美需求的合一与互补。

〔作者简介〕刘敬圻，女，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专著《明清小说补论》等。

（责任编辑 石 雷）

<sup>①②</sup> 《蒲松龄集》上卷，第71页。